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 汉语学习者词汇习得研究

蒋荣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 汉语学习者词汇习得研究

蒋荣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汉语学习者词汇习得研究 / 蒋荣著. —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619-3518-7

I. ①基… II. ①蒋… III. ①汉语—词汇—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8492号

书 名: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汉语学习者词汇习得研究
JIYU SHEHUI WENHUA LILUN DE HANYU XUEXIZHE
CIHUI XIDE YANJIU

责任印制: 姜正周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82303650 / 3591 / 3651

编辑部 010-82303647 / 3592 / 3395

读者服务部 010-82303653 / 3908

网上订购电话 010-82303668

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blcup.com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9.25

字 数: 20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19-3518-7 / H · 13093

定 价: 29.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82303590



序

这本书报告了一项基于社会文化理论，讨论语言教学中的互动问题的研究成果。对对外汉语教学来说，社会文化理论还是一种新鲜事物，因为我们的汉语教学设计基本上没有自觉地吸取过这种理论。本书第一次把它引进汉语教学，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探索。

笔者不熟悉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但在通读全书之后，有以下三点收获。

第一，对语言习得和学习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多年来，围绕第二语言是“习得”的还是“学得”的一直争论不休。笔者的印象是，从理论上说，似乎“习得论”占据上风，所以人们越来越强调使用是获得语言能力的最好方法；但是从实践上看，似乎还是“学得论”占据上风，因为语言教学还是在不断发展，包括很多欣赏“习得论”的教师，也从未放弃通过教学来帮助学习者“学得”第二语言。运用社会文化理论，可以对“习得”和“学得”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语言是“习得”的，但是这种习得不是个体行为，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教学中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各种不同的支架，都属于这种社会文化环境。这样，“学习”和“习得”就有了接口，教和学是习得的社会文化环境。语言教学就是要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

境，即设计良好的语言教学途径，提高学习者习得的效果。

第二，促进了对语言教学方法的思考。这项研究探讨建立在社会文化理论上的汉语词汇教学途径。汉语词汇教学是汉语教学实践和汉语教学研究中的一个软肋。尽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词汇教学在语言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迄今为止，汉语词汇教学研究，特别是词汇课堂教学的研究仍是凤毛麟角。这项研究提供的三个词汇教学实验，属于这种“珍稀”研究。从这三个实验中可以看出，至少对于汉语初级学习者来说，教师支持的学习方式、客体调控的学习方式、显性的教学方式，是有利于学习者学习词汇的最佳的社会环境。这不仅对于我们选择词汇教学的途径有重要的启发，同时也说明，词汇获得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互动的结果。那么，语音、语法、汉字、语篇、功能的获得，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第三，看到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自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冲破阻力，以语言习得与认知的途径，被引进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之后，的确给本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的这种研究，可以看做是继 80 年代初期提出学科基本框架后，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一次新的升华。从偏误分析到中介语研究到习得顺序研究到汉语认知研究，研究不断深入，这当

然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却有与汉语教学实践渐行渐远的趋向。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汉语教材、课堂教学、教学法著述中，鲜有踪迹。这项研究的三个实验都是在课堂教学中进行的，得到的结论对汉语词汇和其他语言要素的教学思路和方法提供了直接的（不是拐弯抹角的）启发。这也是这项研究的值得提倡之处。对外汉语教学需要更多的这种在科学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需要更多的把成果转化为教学实践的研究。

由以上三点收获，有两点联想。

第一，要坚持学习和引进国内外新的语言教学理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发展，是以不断学习和引进新的语言教学理论为重要条件的。上世纪50年代初期，邓懿先生带领诸先贤“隐性学习”了美国听说法的教学思路；改革开放以后，吕必松先生带领诸前辈积极学习、引进国外语言教学理论，把语言教学流派研究、交际教学法、第二语言习得、语言与文化等理论和方法引进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使学科日臻成熟。本世纪初，在汉办引领下，及时地学习了美国《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欧洲语言共同框架》、中国《英语课程标准》等倡导的新世纪的语言教学理念和方法，制定了《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等，

丰富了学科的内涵，对加快汉语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知识背景的限制，本领域的大部分教师和研究者学习、汲取新的语言教学理论的积极性大不如前了。如任务型教学模式、后方法时代的理论、新世纪的语言教学理念、北美中小学日渐扩张的沉浸式教学模式、教师教育和发展的理论等等，我们的学习和引进就大大滞后，甚至以汉语教学的特殊性为由，理直气壮地不闻不问。长此以往，我们必然失去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失去引领国际汉语教育发展的资格。

第二，要花力气研究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要研究教学，这本是理所当然的道理，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学界对汉语研究、心理学角度研究的重视程度，大大高于对教学，特别是课堂教学的研究。这从本领域主要杂志发表的文章和博士论文研究的问题，不难看出。面对汉语教学发展新形势提出的诸多新问题，没有科学扎实的教学研究，就找不到好的解决途径和教学方法，没有好的教学方法，就得不到好的教学效果，没有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就会流失，大好形势就难以为继。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某些语言教学的前车之鉴。因此，学界需要继承先贤们理论联系实际

优良传统，努力把“理所当然”的汉语教学研究变为“理所当然”的现实。

本书作者自己已经说明，本书不是没有缺点，但是这项研究在汲取新的理论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做实实在在的教学研究、课堂教学研究的方法等方面，的确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所得到的结论对词汇和其他语言要素教学都可以直接借鉴，是一本值得认真一读的好书。

此书付梓之际，作者嘱我写几句话。其实我对本书涉及的社会文化理论和互动理论基本没有了解。但碍于师生情谊，只好勉为其难，以不成熟的感想应对。希望这些话不会有损本书的光彩。

崔永华

2013年4月



摘要

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关于互动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已经有 30 年的历史了，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基于行为主义的研究还是基于认知主义的研究，都没能对互动是否有助于习得，以及互动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和机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实验研究的结论也莫衷一是。而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从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从知识获得的哲学高度来探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社会属性，关注互动发生的社会因素，强调学习包括语言学习首先发生在社会文化环境中，从而突破了基于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的研究仅关注个体行为的狭隘视野。因此，本研究选择了社会文化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一次直接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来研究互动问题，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和互动影响这一习得过程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从而拓展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领域。

本研究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从词汇习得入手，探讨非汉字文化圈的汉语学习者采取不同的调控方式、支架类型和词汇学习方式对汉语词汇习得效果的影响。

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词汇习得过程的实验研究，考察初级、中级、高级汉语学习者

实现客体调控、他人调控和自我调控的动态过程以及三种调控方式对词汇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初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还主要依赖客体调控和他人调控的方式；中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虽然显示出他人调控能力和自我调控能力的增强，但依然存在中间阶段，他们可能和初级水平的被试一样，都还处于客体调控或者他人调控阶段。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则已达到自我调控的阶段。而且，随着学习者自我调控能力的发展，使其他两种调控能力也同时得到发展。因此，三种调控方式都成为了高级水平的学习者词汇习得的渠道。实验结果表明，成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词汇习得过程既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倾向性，同时各个阶段也出现了重合。我们因此推论，在成人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中存在常态和特定状态两个层次，并据此提出“习得过程动态性假设”。

研究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是关于习得机制的研究。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因素不外乎两个：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本研究也正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研究的第二部分在支架模式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四种支架合作类型和词汇理解与词汇产出任务对第二语言学习者词汇习得的影响，探讨从客体调控阶段转化到他人调控阶段的外部环境影响机制。实验结果表明，在最近发展区内，支架式合作对初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的词汇理

解和词汇产出都有促进作用。在三种支架合作方式中，对初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而言，师生合作的模式最有利于学习者的词汇习得，高低水平的学习者合作的模式对词汇习得的促进作用次之，相同水平的学习者合作的模式虽然也有利于词汇的发展，但促进作用最小。实验结果表明，对初级水平的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引导机制决定了词汇习得的效果。

研究的第三部分是考察三种不同的学习方式对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的影响。本研究是对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内在获得机制的考察。结果显示，明晰式的词汇学习方式和伴随性的词汇学习方式都有助于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的词汇习得，但外显的、明晰式的词汇学习方式比内隐的、伴随性的词汇学习方式更有利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词汇获得。实验结果表明，对于初级水平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外显的学习对于语言规则的学习效果优于内隐学习，但内隐学习也是语言能力与语言知识获得的重要途径。

总之，运用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来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和教学问题还刚刚起步。我们的研究只是尝试性的、探索性的，但我们坚信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未来的研究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1

- 1.1 选题缘起 / 1
- 1.2 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4
- 1.3 研究框架 / 5

第二章 研究概述 / 6

- 2.1 互动理论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 6
- 2.2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 18
- 2.3 社会文化理论与互动理论对互动的不同理解 / 35

第三章 本书研究的问题 / 38

第四章 三种调控方式对词汇习得的影响 / 41

- 4.1 实验目的 / 41
- 4.2 实验方法 / 41
- 4.3 实验结果 / 44
- 4.4 讨论 / 47
- 4.5 结论 / 51

第五章 他人调控对汉语学习者词汇习得的影响 / 52

- 5.1 实验目的 / 52
- 5.2 实验假设 / 52

5.3	实验方法	/	52
5.4	实验结果	/	54
5.5	讨论	/	58
5.6	结论	/	60
第六章 自我调控对第二语言学习者词汇习得的影响 / 62			
6.1	实验目的	/	62
6.2	实验假设	/	62
6.3	实验方法	/	62
6.4	实验结果	/	65
6.5	讨论	/	68
6.6	结论	/	72
第七章 综合讨论与结论 / 73			
7.1	从调控方式看第二语言词汇习得过程的阶段性和倾向性	/	73
7.2	从支架合作方式看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的机制	/	75
7.3	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对词汇习得的影响	/	78
7.4	结论	/	81
第八章 本研究对教学的启示 / 82			
8.1	关于第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作用的再思考	/	82
8.2	关于第二语言教学过程中互动关系和互动过程的再思考	/	85
8.3	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基于互动的支架式教学模式	/	88
8.4	小结	/	90

第九章 余论 / 91

9.1 本研究存在的问题 / 91

9.2 今后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91

参考文献 / 93

附 录 / 115

附录一：实验一的实施及测试材料 / 115

附录二：实验二测试材料 / 128

附录三：实验三测试材料 / 129

致 谢 / 134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缘起

语言习得的发生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即内在的语言习得机制和语言输入环境。语言习得机制是语言习得发生的内因；语言输入环境是语言习得发生的外因。没有语言输入，语言习得就不可能发生。儿童语言习得是自然发生的，但没有语言输入，没有与社会和他人的互动，语言习得也不可能发生。狼孩语言能力的缺失充分证明了输入（input）与互动（interaction）对人类语言习得的重要意义。而对大多数成人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课堂是语言习得发生的重要外部环境。课堂中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不仅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也是学生获得语言输入的主要途径。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是否有互动，互动的时间、方式、效果是决定第二语言习得效果的重要因素。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习者是课堂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课堂教学过程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宏观上，教育社会学者认为，教育和教学的全过程都体现了一种师生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教师通过教学过程中的言语行为影响和改变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行为变化，另一方面学习者的反馈也会对教师的教学行为产生影响。教育和教学过程是师生相互作用构成的动态系统。在第二语言课堂教学中，教师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帮助第二语言学习者理解和掌握目的语的各个方面的知识，他们是学习者获得第二语言输入的主要源泉。正如 Ellis（1994）指出的“不同的输入提供不同的知识，但重要的是，各种不同的输入都是为了有助于该知识的习得”。Johnson（1995）对第二语言的课堂教学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更积极的阐释：“在第二语言课堂教学中，教师提供的关注意义的教学指导（meaning-focused instruction）能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应用目的语完成交际功能的机会；而那些关注形式的教学指导（form-focused instruction）则更能引发学生对语言的结构和组织的思考。”学习者也运用各种学习策略和技巧参与教学过程，构成课堂互动。实验证明，不论这种互动是否是自然和真实的，都将有助于实现不同的课堂教学目标，促进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熟练程度的提高。

笔者在正式研究开始之前曾进行一次探测性研究，选择了两位教师（一位新教师和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给他们同样的教案，分别给同水平的两个班上

课。结果，在课后的词汇和语法测试中，两个班学生的成绩差异显著。在对两位老师的课堂教学录像进行分析时，笔者发现，老教师在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都与学生进行了互动，互动次数为 12 次，而新教师却几乎从始至终都在独自讲授，只有两次与学生互动的机会。笔者随后对两个班的学习者进行了访谈，考察他们对课堂互动的看法，结果两个班的学习者都表示，互动能增强他们对所学内容的兴趣，提高他们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增加应用目的语的机会，促进他们对目的语知识的理解，加快第二语言知识内化的过程。而有效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正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目标之一。

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互动有着特定的含义，它专指语言输入的环境。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关于互动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Hatch & Wagner-Gough, 1976; Hatch, 1978; Peck, 1978），至今已经有 30 年的历史了。根据其理论依据和研究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从 7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主要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考察语言形式调整与功能调整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它以学习者的语言产出为主要研究对象，以 Long（1983）提出的“互动假设”为理论基础。第一阶段的研究以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所获得的语言输入进行描述与分析为主，主要考察针对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输入的形式调整和功能调整是否能为他们提供可理解输入，这种可理解输入是否有助于第二语言的习得。该阶段的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是关于“外国人话语”的研究（Arthur et al., 1980; Conrad, 1989; Ferguson, 1971; 1977; Freed, 1980; Long, 1980; 1983; Pica et al., 1987; 1988）。由于第一阶段仅从外部输入环境的角度考察互动与习得的关系，缺乏理论的支撑，因此，研究无法深入，各种实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这种现象促使研究人员开始转换研究视角，寻找新的理论依据。

80 年代中后期，互动研究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大约从 80 年代中后期至今，这一阶段的互动研究主要是从心里语言学的角度，将语言输入的外部环境与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结合起来探讨互动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Swain（1985）提出了“语言输出假设（output hypothesis）”，希望从语言输出而不是语言输入来考察语言环境对语言习得的影响。但无论是“互动假设”还是“语言输出假设”都缺乏明晰有力的证据证明语言输入或者输出环境有助于语言习得。因此，互动理论的研究者开始探讨互动影响习得的内在习得机制。Long（1996）从信息加工的角度对“互动假设”进行了重新阐释，指出“互动环境是通过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和学习者发展中的第二语言加工能力来促进第二语言习得的。这些资源

整合在一起在意义沟通过程中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一阐述强调语言输入形式、互动环境与学习者内在因素的结合，试图从外部环境与内在机制两个角度来全面解释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但遗憾的是，这一阶段的研究迄今为止亦未取得令人信服的、一致的结论。关于互动理论还需要更多的实验研究来证实。

90年代初期，随着维果斯基（L. S. Vygotsky）社会文化理论在西方心理学领域的兴起，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James Lantolf（1994；2000；2006）是这一阶段的集大成者。他第一个把维果斯基的理论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相结合，并应用社会文化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问题。他系统地介绍了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容，以及该理论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的应用。社会文化理论的引入突破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仅仅关注个体行为的狭隘视野，从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知识获得的哲学高度来探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社会属性，关注语言习得与社会因素的广泛的联系，从而使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完整的理论支撑，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由于社会文化理论把互动视为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生、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样关注互动的问题。因此，我们把这一阶段看作互动研究的第三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在时间上有一定的重合，但因为两者依据的理论背景迥然不同，研究方法也有差异，我们把它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80年代后期至今，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在西方的心理学领域、教育学和第二语言习得领域都引起了研究热潮，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来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问题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与互动有关的研究还非常有限，而且这些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比如研究三种调控方式的分类、支架建构的过程与作用等。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真正直接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来研究互动过程与习得效果的关系的研究，也没有找到从社会文化理论的角度对互动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进行阐述的论著。

由于国内关于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基本限于教育心理学领域。在二语习得领域还没有直接运用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进行的相关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是一个新的尝试。本研究选择了社会文化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一次直接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来研究互动问题，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以及互动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机制，从而拓展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的领域，并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